

全

大家文存
粤海评论丛书

钟敬文集

包莹编

钟敬文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I106-53

85

C11-4



大家文存
粤派评论丛书

钟敬文集

包莹编

本项目受广东省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出版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钟敬文集 / 包莹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5
(粤派评论丛书)

ISBN 978-7-218-12415-5

I. ①钟… II. ①包… III. ①民间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②民俗学—中国—文集 IV. ①I207.7-53 ②K8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310452号

ZHONG JINGWEN JI

钟敬文集

包莹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责任编辑: 胡扬文

装帧设计: 张绮华

排版: 广州市奔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技编: 吴彦斌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 × 1092毫米 1/16

印张: 29.25 字数: 300千

版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8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粤派评论丛书”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音序排列)

学术顾问：陈思和 温儒敏

总主编：蒋述卓

执行主编：陈剑晖 郭小东 贺仲明 林 岗 宋剑华

编 委：陈剑晖 陈平原 陈桥生 陈小奇 古远清

郭小东 贺仲明 洪子诚 黄树森 黄天骥

黄伟宗 黄修己 黄子平 蒋述卓 林 岗

刘斯奋 饶芑子 宋剑华 谢有顺 徐南铁

许钦松 杨 义 张 柠

总序

近百年来中国文坛，“京派批评”“海派批评”以及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闽派批评”已是大家公认的文学现象，但“粤派评论”却极少被人提起。事实上，不论从地域精神、文化气质，还是文脉的历史传承，抑或批评的影响力来看，“粤派评论”都有着独特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有它的优势和辉煌。只不过，由于历史、现实、文化和地域的诸多原因，“粤派评论”一直被低估、忽视乃至遮蔽。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以百年粤派文学以及美术、音乐、戏剧、影视等评论为切入点，出版一套“粤派评论丛书”，挖掘被历史和某种文化偏见所遮蔽的“粤派评论”的价值，彰显粤派文学与文化的独特内涵和深厚底蕴，不仅能更好地展示广东文艺评论的力量，让“粤派评论”发出更响亮的声音，而且有助于增强广东文化的自信，提升广东文化的影响力，促进区域文化的繁荣发展。

出版这套丛书，有厚实、充分的历史、现实、文化和地域等方面的依据。

第一，传统文化的影响。岭南文化明显不同于北方文化。如汉代以降以陈钦、陈元为代表的“经学”注释，便明显不同于北方“经学”的严密深邃与繁复，呈现出轻灵简易的特点，并因此被称为“简易之学”。六祖惠能则为佛学禅宗注进了日常化、世俗化的内涵。明代大儒陈白沙主张“学贵知疑”，强调独立思考，提倡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逐渐形成一个有粤派特点的哲学学派。这种不同于北方的文化传统，势必对“粤派评论”的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二，文论传统的依据。“粤派评论”的起源可追溯到晚清，黄遵宪的“诗界革命”，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开创了一个时代的风潮，在

全国产生了普泛的影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黄药眠在《创造周报》发表大量文艺大众化、诗歌民族化的文章，风行一时。钟敬文措意于民间文学，被视为中国民间文学的创始人。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粤派评论”的代表人物有黄秋耘、萧殷、梁宗岱等人。新时期以来，“粤派评论”也涌现出不少在全国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文艺评论家。如饶芃子、黄树森、黄修己、黄伟宗、洪子诚、刘斯奋、杨义、温儒敏、谢望新、李钟声、古远清、蒋述卓、陈平原、程文超、林岗、陈剑晖、郭小东、宋剑华、陈志红等，其阵容和影响力虽不及“京派批评”和“海派批评”，但其深厚力量堪比“闽派批评”，超越国内大多数地域的文艺评论阵营。如果视野和范围再开放拓展，加上饶宗颐、王起、黄天骥等老一辈学者的纯学术研究，则“粤派评论”更是蔚为壮观。

第三，地理环境的优势。从地理上看，广东占有沿海之利，在沟通世界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广东处于边缘，这既是劣势也是优势。近现代以来，粤派学者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感受并接受多种文明带来的思想启迪。他们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不安现状，积极进取，敢为人先，因此能走在时代变革的前列。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秉承中国学术的传统，又开创了“粤派评论”的先河。这种地缘、文化土壤的内在培植作用，在“粤派评论”的发展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

“粤派评论”有属于自己的鲜明特点。

第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是“粤派评论”最为鲜亮的一道风景线。在这方面，“粤派评论”几乎占了文学史写作的半壁江山，而且处于前沿位置，有的甚至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高地。比如20世纪80年代，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联合发表的著名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其中陈平原、黄子平均为粤人。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方法先进、富于问题意识、善于整合中西传统资源和吸纳同时代前沿研究成果著称，它与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被学界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南北双璧”。杨义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比较方法运用在文学史写作的有效实践，该著材料扎实，眼光独到，分析文本有血有肉，堪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比肩。此外，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古远清的港台文学史写作，也都各具特色，体现出自己的史观、史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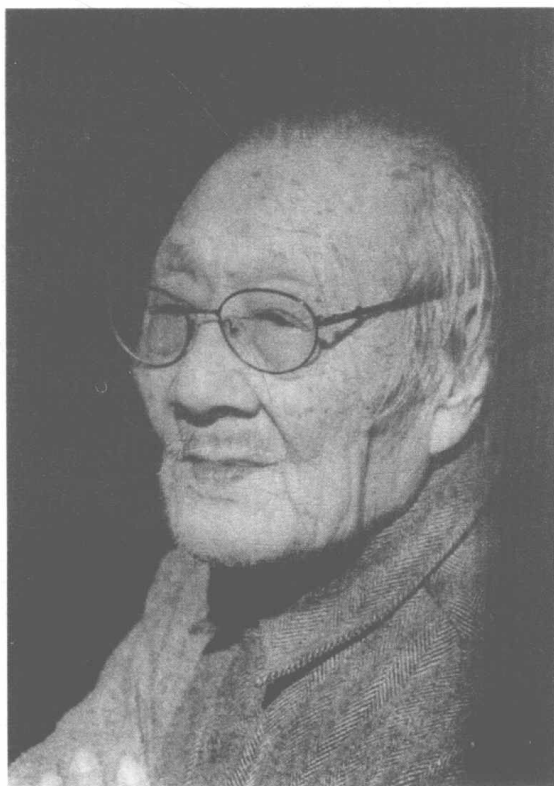
和史德。

第二，“粤派评论”注重文艺、文化评论的日常化、本土经验和实践性。粤派评论家追求发现创新，但不拒绝深刻宽厚；追求实证内敛，而不喜凌空高蹈；追求灵动圆融，而厌恶哗众取宠。这就体现了前瞻视野与务实批评的结合，经济文化与文艺批评的合流，全球眼光与岭南乡土文化挖掘的齐头并进，灵活敏锐与学问学理的相得益彰，多元开放与独立文化人格的互为表里。粤派评论家有自己的批评立场、批评观念，亦有自己的学术立足点和生长点。他们既面向时代和生活，感受文艺风潮的脉动，又高度重视审美中的文化积累和文化遗产；既追求批评的理论性、学理性和体系建构，又强调批评的实践性，注重感性与诗性的个性呈现。

我们认为，建构“粤派评论”，不能沿袭传统的流派范畴与标准，它不是一种具有特定文化立场、一致追求趋向和自觉结社的理论阐释行动。它只是一个松散的、没有理论宣言与主张的群体。因此，没有必要纠结“粤派评论”究竟是一个学派，还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粤派评论”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文化实体，即虽具有地方身份标识，却不局限于一地之见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群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广东省委宣传部策划、组织、指导编纂出版“粤派评论丛书”，是贯彻落实十九大关于文化建设发展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的一次文化实践。我们坚信，扎根广东、辐射全国的“粤派评论”必将成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其中一块最稳固的基石。

“粤派评论丛书”编辑委员会



钟敬文像

编者简介：

包莹，女，1986年生，祖籍辽宁鞍山，在读博士。曾供职于江门广播电视台、中山大学新华学院，现为中山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5级博士生，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寻找“诗心”

——钟敬文与他的文字

包莹

钟敬文是“中国民俗学之父”，他为人所熟知，更多在于他对创建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等人文专业学科所做出的贡献。在学术研究之外，钟敬文的另一重要文名来自他的散文，《荔枝小品》《西湖漫拾》等几个小集子和郁达夫的评价，奠定了他现代散文大家的地位。钟敬文的长寿和良好的身体状况，则使他得以在改革开放之后，继续自己的学术生涯，并在新时期培养出一大批专业人才。读钟敬文的文章，我们会发现他的文字一如他的生活，简单而丰富，不管是写学术论文，还是创作与评论，都贯穿着一股强烈的执着信念，那就是坚持自我与本真，做内心想做的事情。这种信念支持他走完漫长的创作生涯，寻找“诗心”亦是他一生的写照。

钟敬文原名钟谭宗，笔名静闻、静君、金粟等，1903年3月20日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公平镇，幼年曾接受良好的中国传统教育，1922年毕业于广东省陆安师范学校，后回到家乡做小学老师，开始其写作生涯，1924年自印新诗集《三朵花》。1927年，钟敬文到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并担任傅斯年的助教。在中大，他同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杨成志等人一道成立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参与编辑《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并撰写研究歌谣、神话、传说、故事及其他风俗的学术作品。他的《民间文艺丛话》和《歌谣论集》与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赵景深的《童话论集》等书，代表了当时这个领域的最高理论成就。与此同时，他认识了冼星海，见到了鲁迅，出版了《客音情歌集》、《昼歌》、整理本《粤风》，以及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荔枝小品》。1928年夏，由于校方认为钟敬文经手付印的民俗学会丛书之

一《吴歌乙集》含“猥亵”语句，他被迫离职，到杭州任教。

在杭州，钟敬文的心境渐趋平和，江南烟雨开始冲淡广州留给他的纷扰情绪，杭州的人文沉淀以及古朴小巷中的民间色彩，进一步让他看到了人生的转机。在这段时间里，他的主要精力仍在民俗学研究，撰写和发表了三十多篇我国民俗学史上的经典论文。1934年4月，钟敬文留学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师从人类学家、神话学家西村真次教授，攻读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理论，此间他撰写的《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首次提出“民间文艺学”概念，并对它的性质、系统、任务及方法等进行了论述，标志着我国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开始走向整体、系统研究。这一时期，钟敬文还出版了散文集《西湖漫拾》和《湖上散记》，其中《西湖的雪景》等文章入选郁达夫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文艺论集《柳花集》、新诗集《海滨的二月》亦同时问世。

1936年夏，钟敬文回到中国，抗战爆发后在广州第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担任上校视察专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从学院转向军门”。1940年他专门到粤北战地采访，写出一批报告文学作品，出版诗集《未来的春》。1941年，钟敬文“从军门回到学院”，再到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教授“民间文学”“文学概论”“诗歌概论”等课程，1942年出版诗论集《诗心》，1944年出版《寸铁集》。1947年夏遭中山大学非法解除职务，转赴香港达德学院任教。

1949年5月，钟敬文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候补委员和文学工作者协会（作协）常务委员。随后，他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之后一直没有离开。与施蛰存、沈从文等人在1949年以后由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的选择不一样的，对于民间文学的兴趣，源自钟敬文幼年，对于这门学科的专业研究热情，一直贯穿他的整个人生。在北师大中文系，钟敬文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创建了人民口头文学创作教研室（即后来的民间文学教研室），并开始招收研究生，有计划地培养专业人才。与此同时，他参与筹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持创办《民间文艺集刊》和《民间文学》月刊，发表《口头文学——一种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歌谣中的醒觉意识》等学术文章。1957年钟敬文被错划成右派，“文革”中被下放



劳动，但他仍治学不辍，先后撰写了《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家》《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等多篇论文，并坚持旧体诗词创作，以慰人生。

“文革”结束后，钟敬文恢复了所有职称及待遇，1979年与顾颉刚等人共同倡议重建中国民俗学。钟敬文逝世于2002年1月10日，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几年里，他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尽管已到高龄，但他仍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教学、科研工作当中，90年代仍亲自走上讲台授课。

钟敬文从事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前后达七十余年，除了专业研究，他还写了不少散文、诗词等文学作品以及诗论、文论等文学批评，这些作品因体现了作者丰富的学识、睿智的见解、鲜明的语言风格，一直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目前钟敬文作品已经出版了各种选本，其中较为全面的是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钟敬文文集》，这些选本基本上涵盖了他的大部分作品，包括民俗学、民间文艺学、诗学、文艺理论、散文随笔、诗词等多个领域。本次选编《钟敬文集》，主要着眼于钟敬文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编者期冀通过这些文字，为读者更好地理解钟敬文的文艺思想提供一些参考，并与读者一道，“略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与变化。

在阅读钟敬文作品的各种选本与他的传记时，有两本书留给笔者深刻的印象。一是央柳的《少年钟敬文》（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详细记写了钟敬文青少年时期的人生经历，与他一直以来留给我们的耄耋老人之印象不同，少年钟敬文“英俊聪颖，才智超群，慈善而又带有几分刚烈的挑战性格”，“专注民间的各项活动”^①。另一本则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钟敬文逝世后编写的《人民的学者钟敬文》（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翻开此书目录，满眼是钟老的葬礼记录，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敬赠花篮花圈名单、唁电、悼文、挽联等，后附繁厚的悼念文章与钟敬文生平介绍，读来使人心感悲戚。钟敬文刚好一百岁的年月，仿佛就在书桌上摊开的一本本书、一个个文字中走完，他本意不在“立言”，我们这些后生却一直在读他的“言”，在评说他的“功”，民俗学专业的学子对于这一点，或许会有更深刻的体会。与其他许多选本的编者身份不同的是，笔者并不是钟老的学生，在他生前也没有与他有过

^① 叶春生：《少年钟敬文》序，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任何的联系或交往，笔者只是一名年轻的文学系学生，在阅读他作品的过程中选出了后面的文字，凭借的更多还是自己的感悟。亦是基于这个原因，本书在选择文章时，可能会更加偏向“文学”，看重钟老作品中的“文学性”。钟敬文本质上是一名诗人，他在幼年时代即受到中国的旧体诗与传统诗话的启蒙影响，在日后漫长的人生当中，诗歌则是一直陪伴他的精神挚友。他曾说“百年以后能在墓碑刻上‘诗人钟敬文’足矣”^①，老年时书房中检点出来的那个装满纸片的大袋子，记录的便是他这些年的“诗想”“诗话”。

钟敬文十几岁上小学堂的时候开始接触旧体诗，启蒙课本是清代钱塘才子袁枚的《随园诗话》，到了20年代中期，他开始写作诗论。那时他一面采录民间故事、歌谣，一面写作新诗与散文，同时阅读了大量诗话与诗品等传统诗学著作，如王士禛的《带经堂诗话》《渔洋诗话》，叶燮的《原诗》等。此后，在留学日本、回国任教等十多年间，钟敬文始终关注文艺理论特别是诗论的学习和探索，雪莱的《为诗辩护》、萩原朔太郎的《纯正诗论》、波亚罗的《诗的艺术》等都曾带给他启发。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下，钟敬文探索用不同的形式去表达自己的学艺观点，在诗论中的突出表现则是格言式、警句式文体，以及借用现代白话文写就的诗话。钟敬文偏爱格言体，因为这种文章要求极端简缩，不能随意妄为，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淘汰，而且“在这些条件以上，它还需要有特别的精神和光彩”^②。钟敬文的写作，便追求着特别的精神和光彩吧。

《诗心》是钟敬文的第一本诗论集，从题目来看，不管是将之理解成“诗人之心”，还是“诗歌之心”，都容易让人联想到李贽之“童心”，所谓“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用钟敬文的话来说，便是“诗人必须兼有儿童的直观和哲学家的透视”^③。《诗心》的第一句：“诗人的第一件

① 赵仁珪：《我为钟先生整理诗词集》，《钟敬文文集》（诗词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28页。

② 钟敬文：《略论格言式的文体》，《钟敬文文集》（诗学及文艺论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6页。

③ 钟敬文：《诗心》，《钟敬文文集》（诗学及文艺论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功课，是学习怎样去热爱人类。”^①钟敬文提供的是一种兼容、浑朴、开放的眼光。在这种热爱人类、热爱思考、热爱自由的诗情中，我们能感受到“宇宙诏示我们生意的葱茏，同时也感到一种凝重的冷漠”^②之哲思；也能看到救亡青年“森然背影如杉柏，雄劲歌声彻水云”^③之现实图景。钟敬文生于、成长于变革年代，曾经历狂飙突进的“五四”，也走过战火连绵的岁月，在面对与处理这些强硬的现实时，他一直葆有强烈的“拓荒者”意识，比如他说“古代希腊人军队出征的时候，诗人常常走在前头”^④，因为“诗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拓荒者”^⑤，“徒然袭取马耶可夫斯基诗作的外貌的人，是永远和马耶可夫斯基相去千里的”^⑥。但另一方面，钟敬文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重历史过程中的“人”之重要性，而不是仅仅凸显英雄之特质。钟敬文认为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生活中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孤立的。就是那最卓越最杰出的人物，也不是什么虚悬在天空的星球。他们是生活在人们中间，发展在人们中间的。他们是一定历史和社会所影响着的人”^⑦。这正如钟敬文的同时代人冯至所说：“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这些诗行中闪耀的，是他们共同感悟到的时代之光。

钟敬文的诗话，除了谈诗，更谈人生、谈艺术、谈现代生活，如他写

① 钟敬文：《诗心》，《钟敬文文集》（诗学及文艺论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② 钟敬文：《冷漠》，《钟敬文文集》（诗词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23页。

③ 钟敬文：《赠救亡青年》，《钟敬文文集》（诗词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④ 钟敬文：《诗心》，《钟敬文文集》（诗学及文艺论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⑤ 钟敬文：《诗心》，《钟敬文文集》（诗学及文艺论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⑥ 钟敬文：《诗心》，《钟敬文文集》（诗学及文艺论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⑦ 钟敬文：《〈诗心〉自序》，《钟敬文文集》（诗学及文艺论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到：“艺术上的美学观念，往往比实际生活来得落后。歌咏火车轮船的‘美’的诗歌，是在蒸汽机应用多年之后才产生的。”^①这种来自现代生活的审美眼光，与巴金看到省港小火轮时的感受或许是相似的，现代机械的工业之美，已经溢出了古典美学追求优美与崇高的范畴。这种感悟传统与现代变迁的眼光同样体现在钟敬文的散文中，他早期的散文谈荔枝、谈水仙花、谈槟榔，都是南国风物，着眼点在它们背后的历史文化及所包含的民俗意象，他到杭州写西湖雪景，并没有打造圆润一体的西湖美景，而是信笔写下心之所至神之所往，意在打通古今，感受天人合一，因此郁达夫说它们“清朗绝俗”^②。钟敬文后期的散文，则包含他对外族入侵的忧患悲愤、对弱小者的同情，以及对自己命运的感怀。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钟敬文的散文尽管保持着清致淡雅的特质，但不断融入社会生活。他在报告文学《银盏坳》的结尾处如是写道：“我坐在那战垒上，向四面望去。我沉醉在一种浓郁的感兴里。一阵梔子花的香气，把我的心刺醒过来。”“战垒”与“浓郁的感兴”、“刺醒”与“梔子花的香气”，强烈的对比突出的是巨大的虚无与失落，在古典的抒情语调中，钟敬文突破了报告文学新闻式的写法，有效地写出了战争中人物的内心世界。

钟敬文的文字带有较浓的学理性，这与他接受的学科专业训练有关，亦离不开他对生活的思考。钟敬文注重语言的锤炼，他曾说：“一切语言，当它产生的时候，大都是活生生地具有诗趣的。现在我们如果细心体味民众日常使用的语言，也往往可以嗅到那种浓烈的诗的香气”^③。钟敬文在20世纪40年代曾是香港“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参与者，他撰写的几篇讨论“方言文学”的文章，从历史、现实、艺术表现等角度，结合民间文学的形式与特点展开讨论，认为方言文学能够展现语言随社会生活产生的变迁与混杂情况。钟敬文的这些看法不仅仅来自当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产生的政治影

① 钟敬文：《诗心》，《钟敬文文集》（诗学及文艺论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② 郁达夫：《〈散文二集〉导言》，《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页。

③ 钟敬文：《蜗庐诗谈》，《钟敬文文集》（诗学及文艺论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9页。



响，而且与他自身学术思想的发展相关。从最初凭借纯粹的兴趣爱好向《歌谣》投稿，到后来渐渐发现人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与民间文学、民俗学之间的关系，再到30年代日本学习期间受到导师神话学、文化学理论的影响，钟敬文开始综合这些人文学科之间的交叉领域，抗战时期的社会情势则进一步加强了他参与社会实践、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观念。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钟敬文将民间文学从“野生的”状态中规范出来，确立了其口传性、集团性等特点，将之与一般文人文艺区别开来。韦勒克在讨论“比较文学”时，曾指出“它首先是关于口头文学的研究，特别是民间故事的主题及其流变的研究以及关于民间故事如何和何时进入‘高级文学’或‘艺术性文学’的研究”^①，这类文学指涉的对象也可以归入民俗学，民俗学对民间故事的调查与讲述、对其文学格式的结构形态研究，在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之间架通了桥梁，亦能提供文学的民族性。从这个角度来看，钟敬文写作的《中国的天鵝处女型故事》《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财产》《歌谣与妇女婚姻问题》《刘三姐传说试论》等论文，都具有“比较”之意义。关于民俗学与民间文学之关系，钟敬文明确界定为：民间文学作品及民间文学理论，是民俗志和民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口传文学与民间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遗留物，同时亦是“文学”学科的组成部分，对于这些文化现象的考察，除了技术上的科学操作之外，我们要重视的更多的是它们体现出来的精神与灵感，而这些专业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来“文学性”，不管是它们的语言，还是它们的情趣、诗趣。因此钟敬文说，“文学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宗教”，投身其中者，必须怀抱“殉教者的决心”^③。钟敬文在他的“格言”中不止一次提到歌德，提到歌德的“感兴诗”，讲到歌德在与席勒谈话时感叹自己是外物的奴隶，歌德打动他的，或许正是内心的敏感与真实。

①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② 钟敬文：《民俗学与民间文学》，《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87页。

③ 钟敬文：《诗心》，《钟敬文文集》（诗学及文艺论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本书的编选，也意在寻找钟敬文之“诗心”。本书正文分为文学评论、诗话、谈艺录、文艺论、学术论文、外国文学评论等几个部分，其中所选的文章，时间跨度较大，涉及钟敬文创作的各个阶段，亦指向不同的学科。读钟敬文的文字，我们除了可以进入他毕生念兹在兹的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等专业领域，更能感受到他对于诗歌的不变之乾乾热忱；而他在经历百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之时，一直在寻找学术、人生之“诗心”，坚持从生活中发现美，发现诗。钟敬文曾说他十分喜欢何其芳《夜歌》中的几行诗句，单纯、朴素、有新味，写出了生活的流利自然：

我们的敞篷车在开行，
一路的荞麦花，
一车的歌声。

本文亦愿意以此作结，一方面缅怀已远去的钟敬文先生，另一方面作为我们对于自身生存状态之审视与勉励。